

19^辑

我的父亲母亲 王芝琛

“大刀”随想 李继锋

“官营”的尴尬 冯群力

回忆父亲朱培德 朱维亮

一个读书世家的三代人 刘达临

1927年：一个上海家庭的实录 金土

远山农场中的“山民” 徐宗懋

老照片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《大公报》总编辑王芸生与长子王磊的合影（摄于30年代）



苏州少女（摄于20世纪20年代）

林 心 供稿



练字的女孩

摄于 20 世纪 20 年代 (张洪杰 供稿)

目 录

王芝琛	我的父亲母亲·····	1
邵 建	一篇小说、一张照片和一个问题 ·····	18
李继锋	“大刀”随想 ·····	27
冯群力	“官营”的尴尬 ·····	33
朱维亮	回忆父亲朱培德 ·····	42
沈建中	太婆 ·····	58
陈连宝	逝去的岁月 ·····	62
王 岩	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 ·····	66
赵振先	珊 珊 ·····	70
刘天基	我的“军服情结” ·····	77
孙 葳	悲伤的亲情 ·····	84
刘达临	一个读书世家的三代人 ·····	94
白永达	老友轶事 ·····	105
张凤珠	硬汉子陈登科 ·····	116
徐实曾	难忘风雨一故人 ·····	119
苑 茵	往事依依 ·····	122
祝 宇	50年人生之旅 ·····	125
金 土	1927年：一个上海家庭的实录 ·····	130
徐宗懋	远山农场中的“山民” ·····	140
郝桂馨	甘肃国立第五中学建校始末 ·····	144
姜 波	旧影寻踪 ·····	146

老照片

孙济生	20 世纪初的蓬莱阁	150
郑爱军	大槐树下是君家	152

散 木	也说“理想与现实”	155
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冯克力	“正史”乎?“野史”乎?	158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封二 苏州少女(林心) 中插 一个读书世家的三代人(刘达临) 封三 练字的女孩(张洪杰)

《老照片》丛书

总 编 辑
汪稼明
副总编辑
刘传喜
刘瑞琳

古北口形势(张洪杰 32) 一间教会印刷所(力辑 41) 明孝陵的涂鸦(秦雨 57) “大公报号”滑翔机(琛辑 65) 爷爷(唐义 76) 66 年前的一张婚礼照(潘曙山 93)

征 稿

执行主编
冯克力
执行编辑
张 杰
特邀编辑
丁 东
美术编辑
蔡立国
技术编辑
张 涛
法律顾问
张红霞

《老照片》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，每年出版四辑。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，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。

对稿件的要求：所提供的照片须是 20 年以前拍摄的（翻拍件也可），且有一定的清晰度，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、某个人物、某种风俗或某种时尚。文章围绕照片撰写，体裁不拘，字迹工整，传记、散文、随笔、考据、说明均可。

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，无论刊用与否，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。稿件一经刊用，即致稿酬。

来稿请寄：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
《老照片》编辑部 邮 编：250001 E-mail: 1407f@371.net

电 话：(0531) 2060055 转 5407（编辑部）2052472（发行部）

邮购办法：请汇书款（每本书加付 1 元邮资）至上述地址，并注明所购书目。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，须经本社同意。

·私人相簿·

我的父亲母亲

王芝琛

我的父亲王芸生，原名德鹏，“芸生”这个名字还是进天津《商报》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。如果要向父亲追问一句，他会笑着回答：“芸生者，芸芸众生之谓也。”如今年过70的人，提起王芸生，马上都会联想到《大公报》，人们称他与《大公报》，“盖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”而我的母亲冯玉文的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。母亲原本没名字，那时贫苦人家的女孩，没有大号是很平常的事。母亲出嫁后都称她为王冯氏。父亲说，一次由于急需，是他临时给母亲取的名字。父亲给别人取名喜欢按辈分，当时他不会有老冯家的家谱，而是突然想起冯玉祥，心想母亲跟冯玉祥差不多是同辈，于是给母亲取名叫玉文。据说还真有人认为王芸生夫人是冯玉祥的妹妹，其实根本没那回事。我们兄弟姐妹的姓名都是王芝“什么”，中间那个“芝”字，据说是按家谱来的，其实老王家是否有“家谱”大可怀疑，家贫如洗，哪来的“谱”？不过这个“芝”字，可把我们兄弟三人害苦了，就拿我来说吧，这两年我就收到好几封称我这大老爷们儿为“女士”的信。

(一)

1901年9月26日，天津南运河北岸佟家楼一户寒苦的人家里，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男孩——我的父亲王芸生。因为破产，我的爷爷从小就从天津附近的静海县流落到天津市来了。小小年



图① 20世纪30年代，王芸生与长子王磊（王芝光）在天津。



图② 20世纪30年代，王芸生与夫人冯玉文、长子王磊（王芝光）、长女王芝美在天津。

纪，无依无靠，乞讨到了天津西头芥园庙，老和尚收留他在庙里干点杂活，慢慢地学会了烧菜做饭成了厨师。三个儿子中，大儿子后来继承了父亲的手艺，老二后来只是一个看门的人，那个老三呢，由于从少年时代起，就勤学苦干，二三十年后，不仅“成名成家”，竟然成了中国新闻界一位风云人物。

谈起少年时代的生活，父亲深情地怀念着的有两个人：第一个是我的奶奶，为了“改换门楣”，做父母的不忍心让老三也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碌碌一生，再省吃俭用也要送他上学读书，可那一年三节，每节一块现大洋的学费，谈何容易。父亲说：“每到这时，母亲为此四处奔走，然后把借来的‘当’，交我送进当铺，当铺的柜台高，我人矮小，踮起脚来才能把那个小包袱递到探出身子来接的掌柜

的手里，挑剔半天，才从柜台里扔出来，只要够上一块现大洋，我就赶快捡起来，高高兴兴地交给母亲缴学费去了。”

第二个难忘的人是一位姓陈的私塾老师，外号叫“陈扒皮”，据说打起学生来跟扒皮似的。但陈老师知道父亲念书非常用功，非常规矩，不仅不打他，反而经常安慰他。几十年后，父亲谈起陈老师还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老师不严，学生是学不出东西来的。而一位真正要求严格的老师，终究会成为学生感念的‘慈师’的。”

“勤”与“苦”是父亲终身信守，并受益不尽的。他读私塾时是这样，自学英文也是这样，即使在做茶叶店小学徒时，仍不忘勤读苦读。他常常用下面两句诗自勉自励并教育我们：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”

(二)

母亲比父亲小两岁，出生于天津近郊杨柳青。我的外祖父是个菜农，靠种蔬菜过活。母亲没有上过学，不能责怪外祖父母，他们那里祖祖辈辈就没有女孩子上学的，更何况也没钱供。母亲一辈子念叨自己是“睁眼瞎”，总怨命。

母亲的脚是典型的“解放脚”。所谓“解放脚”就是裹了放，放了又裹，介于小脚与正常脚之间。父亲曾跟我说过：“我身后的小辫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；你妈的脚是由我解放的。”这话虽有点夸张，但也有点理。父母婚前，媒人曾经问过我奶奶：“媳妇要小脚还是大脚？”一旁的父亲坚决回答：“是小脚就退婚！”媒人听错了，传成了：“是大脚就退婚！”害得母亲又裹起了脚，痛得哭了一夜。第二天知道媒人传达错了，才赶快“松绑”。父母的婚姻，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。父亲虽不情愿，但又不愿反抗“母命”，勉强接受下来。

无论我的同学还是朋友，当他们知道我的母亲是个文盲，都大为惊讶，心想堂堂的大公报馆总编辑的妻子连字都不识，难以



图③ 王芸生夫人冯玉文与长子王磊(王芝光)、长女王芝美、次女王芝慕、次子王芝秋、三子王芝琛, 1938年夏在汉口。左二是王家保姆。

理解。然而又都众口一词：“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虽说父母走到一起是偶然，或者说是“缘分”。但他们靠的是几十年患难相扶，甘苦与共，从而达到感情弥笃。

父母的婚姻是经过风雨考验的。记得抗战时，重庆有位文官考试“女状元”爱慕父亲的文才人品，写信以身相许，父亲对于这位“女状元”的主动求爱，开初相当一段时间，尽量回避。时间一长，心也动了。有段时间，父亲下午的会客时间，几乎全部

被她占据，吟诗作画、谈情说爱，十分融洽。尚不知怎么回事情的母亲照样端茶送饭。记得有一次这位“女状元”又来我家时，让我在家门口碰上，我用手指刮脸皮，嘴巴不断嚷嚷：“没羞，没羞，没脸皮！”一定是母亲听到了，她冲出门口，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，母亲还从来没这么打过我。

当这位才貌并举的“女状元”，认为她终于打动了我父亲的心后，就主动找我母亲，称母亲为“冯大姐”。说：“现在社会上有两房三房太太的有的是，大姐不必在意。”某一天，父亲终于与母亲把话谈开了，没有眼泪，更没有吵闹，母亲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你不说，眼前的事我也看懂了。我们确实不相配，尤其你做事我帮不上忙。我打算回老家，但仍希望孩子们继续读书，不要像他们妈那样，一辈子‘睁眼瞎’。”此时，母亲才动情地掉下了眼泪。听完这位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——我母亲的一席话，父亲没有回答，悄然离去。最后，我们知道的是：父亲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位“女状元”的求爱，退回了全部情书、情诗……尽管后来还收到其上千言的“血书”，仍不为所动。我以为，是母亲的善良与宽厚、诚实与坦荡、纯朴与无私，征服了父亲的心。

(三)

父亲不喝酒、不吸烟，甚至也不喝茶。几十年来一直是干报馆工作，无论是当编辑主任，还是当总编辑，都是熬夜的活，有时为了等新闻，回到家已是清晨三四点。每晚工作后，虽十分疲乏，饥肠辘辘，也从不在外吃夜宵，也不让母亲为他准备夜餐，回到家只要几块饼干和一杯白水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

我们兄弟姐妹，起先还常常被母亲喝斥，后来都养成习惯，不管是上课，还是节假日，清早起床穿衣洗漱、抹桌吃饭都轻手轻脚，生怕吵醒熟睡的父亲。记得有一次，不知要拿什么东西，

必须进父亲卧室，经母亲批准，我摸黑进屋，越是小心越是出差错。哐啷！我踢倒一把椅子，吓得我魂都没了，心想一定要挨揍，最起码也得挨骂，只听见父亲翻了个身，又“呼”上了。走出房门，却遭到母亲的一记揍。

每天一篇社评，这是《大公报》的老规矩，早在张季鸾先生去世（张先生1941年9月6日去世）前，父亲就已担起这副重担。那时他每天回家时间很短，回来也只是睡睡觉，由于劳累，“上火”的事又多，经常流鼻血，厉害起来一流就是痰盂小半盆，真把我们吓坏了。母亲赶忙将凉水浸过的毛巾敷在父亲头上，他用手捂住毛巾，继续干他的事。母亲也不敢劝，一劝他就急。

我们家始终是跟着《大公报》颠沛流离，天津、上海、汉口、重庆，又回上海……1938年秋，武汉大撤退，《大公报》也从汉口撤往重庆。父亲率《大公报》汉口版全馆人员乘江华轮溯江而上。船行至宜昌遭日机轰炸。我们全家都在江华轮上，才一岁的我，由于发高烧，母亲在船舱内用煤油炉给我煮点稀饭，不慎将稀饭碰洒在前胸，满胸燎泡，到重庆后好几个月方愈。

我们在重庆的第一个家是在白象街。1939年5月3、4两日敌机两次大轰炸，《大公报》亦遭其难，我家房屋被震倒一半，那时父亲从来不跟我们一起躲警报，大哥、大姐各自都在学校，我和二哥由母亲领着正在楼梯间，幸免于难，二姐在一个写字桌底下躲着，被埋于废墟中，事过半个多小时，才把她挖出。1941年6月，“重庆防空壕大惨案”，父亲就在洞中。据他说，敌机空袭时，当时有的人要进，有的人要出，把洞口堵住了，闷死不少人，只见许多人赤身裸体往洞口挤，他是得到一位难友给了两粒人丹和一小块八卦丹含在嘴里，才得幸免。

有一阵子，《大公报》干脆搬到防空洞里出版发行，父亲和他的同人们，就是这样跟日本鬼子对着干，写出多少坚决抗战的好文章啊。正像父亲所言：“本报同人，几枝秃笔，一张烂纸，

颠沛流离，从事言论工作，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。”

我们家的生活，虽没缺过吃穿，但日子仍过得清贫。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是靠父亲一人的薪金过活。父亲领回薪金后，往往还要接济一些亲戚朋友，余下的才由母亲支配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在重庆八年多，几乎没穿过新衣服，衣服都是拣哥哥的穿。记得某个春节，母亲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，我连大年三十都没舍得穿，而是放在枕头边，等到大年初一早上才穿上，之后就在整个报馆里跑，许多父亲的同事都逗我说：“王小弟，今天穿新衣服啰！”我们的内衣内裤经常是用报馆处理的油墨布做的，虽然事先母亲已用碱水洗过多次，字迹看不太清楚了，可是穿在身上仍然能闻出油墨的味道。

我不喜欢与父亲同桌吃饭，因为他规矩太多太严。吃饭不许说话，不许发出声音，无论是碗筷声，还是“吧嗒嘴”。夹菜也有规矩，不许“搭桥、过河”，实际上就是不许挑菜吃，不许专挑肉或蛋。这时，往往是母亲站起来给我们拨点好吃的菜。

父亲对我们的课外阅读管得特别严。记得抗战胜利，我们又回到上海，我和二哥有时向母亲磨点零花钱，租本小人书，其实不外乎《荒江女侠》、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之类，给父亲知道了，绝对逃不过一顿揍。大哥王磊（原名王芝光），在同济大学念书时，跟同学玩桥牌，赌输赢。有一次将铺盖和洗脸盆都输掉，被父亲知道后，又罚跪、又挨打，甚至于把拖把棍打断，母亲心疼去护着，还挨了一棍。至于父母亲打架，我们从来不问缘由，统统向着母亲。

（四）

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的变化相当大。我们兄弟姐妹都有共同的感受，我大哥甚至说他好像判若两人。尽管这种变化有个过程，但变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。我把这种变化过程归纳为三部

曲：短期的兴奋，长期的犹豫，最后的痛苦。

父亲是得到毛泽东口头请柬，最后下定决心北上，到解放区来的。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，初衷不改，不想为官，文章报国，为《大公报》事业继续奋斗。开国大典，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颇为兴奋，祈祝祖国的新生。

与此同时，一件件使他难以理解的事发生了，喜庆逐渐变为懊丧。当他还未踏上解放区土地，就得知天津《大公报》在自我大批判基础上，易名为《进步日报》。他甚至不敢想，这是违背承诺。之后重庆《大公报》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《重庆日报》，他想都来不及，只顾得上庆幸上海《大公报》没有更名。

父亲说：“别说是大的政治运动，就是经常性的政治学习，也不会放过对《大公报》的批判，并不断启发我进行‘自我批评’”。“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”、“脱裤子割尾巴”、“剥画皮、撕伪装”、“脱胎换骨”、“刮骨疗毒”、“连滚带爬也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”。他深知，从“文人论政”的报纸到“喉舌”不允许有过渡期。母亲对我说：“这些个年月，你爸是经常带着个铁青的脸回家。不用问，又挨批了。”母亲还说：“你爸的运气也太差，张先生（张季鸾）去世得早，就不要说了；胡先生（胡政之），上海马上解放了，他也去世了。如果他俩哪怕剩一个，你爸也不至于只是一个人当‘活靶子’，让他们来回打。”

父亲的火爆脾气变得温和多了，文人所固有的那份矜持和清高也不见了。有一次他回家，脸色相当难看，母亲知道又“受气”了。一打听，原来是父亲请一位同事办件什么事，他不仅不办，反而骂父亲：“你有什么资格，老反动派！”母亲忿忿不平地说：“你爸那个总编辑，还有什么社长，比样子货还不如。”父亲他变了。他确实变了，他没有愤怒，没有还口，有的只是无奈与悲伤。后来听母亲说：“那个骂你爸的人表现很进步，入党啦。”

1952年，父亲应召晋京谒见毛泽东，毛指示《大公报》北



图④ 王芸生、冯玉文夫妇与六个子女的合影（前中为三女王芝瑜）。1948年9月摄于上海。

迁天津与《进步日报》合并，仍叫《大公报》，先在天津出版，待北京馆建成后迁京出版。毛泽东还风趣地说：“王大公，恭喜你恢复失地了啊。”父亲确实受到极大地鼓舞，他鼓起余勇，力图重振《大公报》昔日的雄风。不久，他还是明白了，时代不同了，“文人论政”已成为明日黄花，今日的喉舌已不需要他那样的人了。心凉了，人也变老实了。

1957年，由于得到毛泽东保护，父亲没有被划为右派，涉险过关。反右后不久，上面就正式通知他，名誉上仍担任大公报

社社长，实际上不必过问《大公报》的具体业务，专心从事“学术研究”。自此，他放下了作为报人的笔，惨淡的心情，隐隐作痛，无以言状。

不知出于何意，上面决定把《大公报》的历史写出来，而执笔人“非王芸生不可”。父亲执意推托，但当周恩来第三次为此事找他，并告知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，他就再也不敢违抗了。他集解放后对《大公报》人、事批判之大成，无限上纲，完成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违心之作。

不知是否算变化，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，无论是恋爱婚姻，还是升学、就业都不参与意见，采取大撒手的态度。并以此奉劝母亲。他对母亲说：“他们都有组织，我们不要操心。”他说的还真有道理，因为我们之中有好几个人的恋爱对象都须要经过政审，由组织批准。但有例外，1955年我高中毕业时打算报考文史类大学。父亲知道后很生气，表示坚决反对，说我太不懂事，最后我还是听了他的话。两年后，当我听说读文史专业的高中同学，全部被划为右派时，我才领悟理解父亲的好意。

父亲还有个变化，那就是帮母亲干家务，他知道自己不会烧饭做菜，但他主动承担“采购”任务。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，每天一清早他就拿着铝锅去打豆浆买火烧。排队买菜、买肉、取奶都成了他的活。每次采购完总是那么高兴。

在全国大饥荒的岁月里，由于父亲有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，上面发了个“特供证”，每月特殊供应点肉、蛋、油、白糖等副食品。在政协礼堂一侧有个小小的虚掩的柜台，我陪父亲去过。为此他总是感到受之有愧，老是跟母亲商量给这个一点，给那个一点。他俩听说我姥姥、姥爷在乡下全身浮肿之后，急得要命，要弄全国粮票、军用油票（可在全国通用），然而谈何容易。在父亲一再督促下，好歹积攒了点粮油之类，准备托人捎去时，噩耗传来，两位老人相继去世。母亲号啕大哭，说：“他们是活

活饿死的呀！”

那年月，父亲每月有半斤“特供”小笼包子票，可到政协餐厅去吃。有次我探亲回家，一到家，父母亲就催促我去吃，他们说，好容易攒给我的，不要过期了。那天，父亲陪我去吃，两笼小包子一上来，父亲就催促我吃。太好吃了，我一下子把两笼小包子都吃光了，竟然忘掉坐在对面的父亲一口未动。我抬起头来，望着父亲说：“爸，你怎么没吃？”他连忙说：“我有得吃，你吃，你吃。”这桩事已过去近四十年，如今落笔写下来，鼻子仍感到酸酸的。

文化大革命对父亲的冲击不小。他在永安路《大公报》门口扫地，趴在地上拔草。我感到：他老了，身体不行了。朦胧中，“风烛残年”四个字，在我脑海里飘过。整父亲什么问题呢？还不是老调重弹。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，两次提到父亲的旧作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，使毛泽东想起了父亲，周恩来急办解放了父亲。

母亲说，父亲一生中有两个大喜的日子。一是日本投降，二是打倒“四人帮”。“四人帮”垮台，父亲兴奋极了，彻夜难眠，好像又焕发了青春。无论怎样相劝，他还是参加了庆祝游行。我们清楚地看到，他那忧国忧民、爱国爱民的赤子之情，始终没有变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父亲又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分获得了一张“内部购书卡”。我陪父亲去过多次，那是朝阳门内大街一个紧闭门户的书店。文化大革命太坑人啦，什么书都是“封资修”，可这里面有好多书，文学类、哲学类、社会类都有，据说是专供高干阅读参考以及批判之用。像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之类的小说，我买了十几套。父亲买的书就更多啦。为此我又有了新发现，父亲爱书如命，勤读书、苦读书的习惯一点都没变。